

我們如何运用毛澤东思想編写 地方党史資料彙編

編写“党在鄂東地区革命斗争史資料(初稿)”总结的第二部份

历史系鄂東地区革命史編写小組

一、編写地方革命史(資料)必須以毛澤东思想為指導

工作一开始，我們就进行务虛，解决为什么要以毛澤东思想为編写地方革命史(資料)的指导思想問題。在整个工作进程中，我們自始至終抓住了貫徹毛澤东思想这根紅綫，力求站在毛澤东思想的高度来把握鄂東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規律。毛澤东思想是当代馬克思主义发展的高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澤东思想的胜利，鄂東是全国的一部分，党領導鄂東人民革命取得的胜利，也是毛澤东思想的胜利。因此，写地方革命史(資料)必須以毛澤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我們体会到，就最基本的原則和方向來說，我們必須学习和运用毛主席關於中国革命和關於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質、任务問題，历史上人民与反动派两种力量发展的极端相反的邏輯的問題等；就革命史上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來說，我們必須学习和运用毛主席關於各种問題的具体論断和指示，例如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統一战綫的思想等；就研究历史材料的科学方法來說，我們必須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实践論和矛盾論的原理，貫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方法。总之，我們把地方革命史看作是毛澤东思想与地方革命斗争实际相結合的产物，把編写地方革命史(資料)的过程当作学习和运用毛澤东思想来研究地方革命斗争史实的过程，把歌頌毛澤东思想在鄂東地区的光輝胜利，作为編写鄂東地方革命史(資料)的目的。只是由于坚持以毛澤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我們編写出的資料，才比較科学地反映了鄂東的革命历史实际，基本上体现了毛澤东思想，因而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給的任务。

二、必須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反对教條主義的傾向；坚持无產階級的立場，

反对客觀主義傾向

1. 貫徹边学习理論，边熟悉材料，边形成观点的“三边”原則，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与研究具体問題密切結合起来。

編写地方革命史(資料)的过程，作为运用毛澤东思想来認識地方革命斗争史的过程，包含着学习和运用毛澤东思想两个方面。因此，为运用而学习，通过运用更深入地学习，学习和运用密切地結合，就成为我們在資料編写工作中学习和运用毛澤东思想的最基本的特点。这个基本的特点貫串于我們整个的工作过程，形成为边学习毛澤东思想，边熟悉材料，边形

成观点的“三边”原则，这是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具体贯彻。

我们的整个工作过程，就是贯彻“三边”原则，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鄂东革命实际，最后达到观点与材料统一而编写出鄂东地方革命史(资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深入，分析鄂东革命史实的工作也不断深入，二者交错并行，而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纲，引导着史料研究不断深入，直到认识鄂东革命斗争发展的规律。首先集中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文章和有关的党的文件及其他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共产党人’发刊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并按革命史的四个历史时期分为四个编写小组，各组着重学习有关时期的毛主席著作。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小组着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小组着重读“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然后每个人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自己所分配的任务和所迁到的问题，着重地、及时地学习有关文件。

与此同时，研究原材料的工作也逐步深入。即由一般地研究编写地方革命史(资料)的原则和鄂东地区革命斗争史的特点，进而研究编写各个时期斗争史的指导思想、历史特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等，最后深入到各个具体历史事件，运用毛主席的论断分析史料。这样，就逐步地实现了毛泽东思想与鄂东革命历史实际的具体结合，使编写出来的材料基本上能够反映鄂东地区革命斗争史的规律。

为了说明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纲，引导研究工作逐渐深入的问题，这里举一个例子来叙述一下。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我顽三方面军事斗争问题，原始材料中叙述反摩擦斗争的战斗规模大、胜利大，抗日斗争的规模小、歼敌少。开始时，执笔的同志从战斗规模大小(即现象)出发择选材料，结果反摩擦斗争写了八九页，很热闹；而抗日的战斗却大多因“太小”而删去了，不但份量比前者少一倍，而且内容空得多。这一来，鄂东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武装斗争就是以反国民党为主，而不是抗日为主。这就歪曲了鄂东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出了问题，怎么办？学习毛主席著作。读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和“论持久战”中关于游击战的一段，毛主席在文章中說：“游击战中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象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①他說：“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又說：“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②这是多么精湛的思想！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材料中抗日的小战斗，就不再是“上不了书”的小事，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非同小可的事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处理材料的结果，鄂东人民英勇的抗日战史得以再现。

总之，学习毛主席著作与研究具体问题密切结合的结果，我们在理论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没有放下任务先去学理论，而是边干边学地完成了一定的任务；同时通过这次工作提高了理

① “毛泽东选集”二卷，365—366页。

② “毛泽东选集”二卷，462页。

論水平。我們感到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它本身也就显示了毛澤东思想的威力。

2. 联系工作与思想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傾向。

学习并且运用毛澤东思想来研究具体問題这一工作本身要求反对教条主义。例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分期在全国是以“四一二”蔣介石叛变为革命失敗的起点。开始时执笔的同志套了这个公式，但由于鄂东地区的农民运动在“四一二”以后还正处在高潮中，直到“馬日事变”夏斗寅叛变才开始失敗，便立了一个‘四一二’以后，鄂东农民运动的“繼續高漲”的标题。这样把农民运动的高潮人为地割裂为“四一二”前后两段，所謂“繼續高漲”无足够材料可写，而“农民运动的高潮”一节又被削弱了。后来經過四五次討論，最后还是摆脱了全国分期的框框，以‘馬日事变’为分期点，才順利地处理了材料。这証明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方法在要求分析具体問題的实际工作面前是行不通的。

但在我們工作中毕竟还是出現了教条主义的傾向，如有同志說，中央苏区沒有主力紅軍长征以后 还留下大部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情况，因此写紅25軍的历史就沒有毛主席著作可循。我們及时地批評了这种观点，指出应学习毛主席的軍事思想，用以分析紅25軍在两年游击战争中所創造的軍事斗争經驗；学习毛主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防止写艰苦游击战的历史时出現失敗主义傾向等。总之应当学习毛主席处理問題的立場、观点和方法。还有极个别的同志以毛主席著作中的話作按語来串材料，認為这就是毛澤东思想与鄂东革命实际的“結合”，这种傾向当即得到了糾正。

总之，通过这次工作，我們體驗了什么叫具体問題具体分析，什么叫学习毛澤东思想的實質。

学习和运用毛澤东思想还必须联系思想实际。

运用毛主席的立場、观点和方法进行材料的研究，必然会和我們思想上存在的非无产階級立場、观点和方法发生矛盾，当着这种矛盾不克服就无法貫徹毛澤东思想时，我們就停止对具体史料的分析，进行务虛，檢查我們自己立場、观点上存在的問題。这样做的結果，扫除了障碍，扭轉了方向，往往大大提高工作質量。例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急性土改，开始的評价是“反而給根据地的坚持帶來很大困难”，这實質上是“糟得很”的論断。小組从材料的結構着眼，作了三次討論和修改，都沒有改变这个結論，此时总支指出这个結論是錯誤的，必須修改。該組同志根据这一指示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報告”，讀到“‘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图保持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說。”● 这一段，恍然大悟，发现自己的立場根本錯誤，隨即以毛主席这一指示为指导思想，重新研究了全部原材料，逐个修改了急性土改一节中各个問題的結論，从而整个急性土改問題的結論由“糟得很”变为“好得很”，使党領導鄂东农民羣众消灭地主階級，求得自身解放的偉大功勳得到了应有的表彰。

● “毛澤东选集”一卷，17頁。

3. 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反对客观主义。

研究材料的工作要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①的十个字，首要的关键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客观主义反对政治挂帅，要求“材料挂帅”，因此“政治挂帅”还是“材料挂帅”的问题，即反对客观主义的问题，成为资料编写工作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虽然我们当中没有谁自觉地坚持客观主义立场，但由于革命锻炼不够，理论水平不高，又缺乏研究工作经验，所以往往容易受材料的牵引，当了材料的奴隶，造成客观主义的错误。客观主义既直接与党性原则冲突，在资料编写工作中产生的可能性又比较大，所以就成为我们主要应当防止和反对的错误倾向。

事实表明，要贯彻毛泽东思想，必须坚决地、不断地反对客观主义倾向。客观主义强调“让材料说话”，“忠实于原始材料”，采取“材料多就多摆，材料少就少摆”的自然主义态度，从而歪曲了历史实际。例如大革命失败一段，反革命暴行的原始材料很多，执笔的同志强调要忠实于原始材料，逐条地罗列反革命的各种暴行、反革命的狡诈口号以及反革命歌谣，结果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斗争中，反革命被写成了主流，显出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相形之下，革命者成了任人宰杀的羔羊，党和革命群众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斗争得不到表现，革命的希望被淹没了，只听到失败主义的叹息。这种所谓“保持原始材料的真实”其实是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本质，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把握住；在纷繁复杂的材料中，反映历史主流与方向的材料，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选择到，这就是从反客观主义错误中得出的教训。

在我们编写试点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就是客观主义倾向，其他如失败主义情绪等问题都是由这个问题引起的，因此我们展开了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彻底反客观主义的务虚。同志们从自己选材料的教训中深深认识到，不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无产阶级的党性，就没有科学性；体会到所谓“材料挂帅”的客观主义，不可能科学地反映历史真实，在客观效果上必然会为资产阶级服务。在研究方法上，大家特别注意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夫，防止受现象的迷惑，力求抓住真正反映历史本质的材料。自此以后，我们个人编写工作和小组讨论的质量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挂帅深入到了具体材料的研究上。

三、以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作为工作的指南，掌握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来研究地方革命史

我们还特别注意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从而使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我们的工作，经历了如下的主要过程。

首先，集中的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某些主要著作，进行务虚，明确编写工作的目的要求和总的指导思想，之后就开始熟悉材料和编写大事记。此时，我们分工浏览了大部分原始材料，摘录了各县和整个鄂东的大事，按照时间的先后，汇集成了一个大事记。这一工作使我们初步接触到一些感性材料，知道鄂东革命史上发生过什么大事，对鄂东革命史有了一个粗略的印象。这就是开初的感性认识的阶段。

但是这个大事记，仅仅是许多表面现象的罗列，是许多内容纷繁、缺乏内在联系和规律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290页。

性的历史事件的凑合。经过一番研究、分析之后，才初步的找出鄂东地区革命发展的一些特点和规律，編出了大綱和明确了各个时期編写的指导思想。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編写小組对本时期的大事記进行了研究分析之后，把苏区十年土地革命划为三个阶段，分成“党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党为巩固和扩大苏維埃政权而斗争”和“紅四方面軍西征后党领导根据地軍民坚持斗争”等三章，每章下面又分为若干节和若干大小題目，同时根据总的指导思想和編写原則，結合本时期的历史特点，确立了本时期資料編写的指导思想，如要以武装斗争为綫索，要体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等等。这样，就把大架子搭起来了，有了一个大概的体系，指导思想进一步的具体化了。也就是說，已經从感性認識阶段进到初步的理性認識阶段。

編出大綱和明确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以后，就以它为指导，进行原始資料汇編的工作。編大事記时，虽然对原始材料也流覽一遍，但只是走馬看花，看得很粗糙，很不全面，很不深入，所以必須在大綱和指导思想的指导下，仔細的熟悉和占有材料。在这七百余万字的原始材料中，有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珍貴的文献，有調查訪問的材料，也有反动報刊的材料等，总之，材料来源不一，可靠程度各異，有真有伪，有精有粗。怎样熟悉和占有这一大批材料呢？唯一正确的办法是照毛主席所說的那样，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工夫。

党的文献（多半是党在当时当地的重要指示、報告）和調查材料，是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我們大部分选进了，并以它为骨干。与此相反，反动報刊上的材料絕大部分都是不可靠的，如1931年冬，我紅四方面軍打下黃安城，全歼六十九师并活捉該师师长赵冠英，但近在咫尺的伪“武汉日報”却報道說六十九师“兵力頗受損失”，“师长赵冠英失踪”。反动派捏造战果等材料就更多。因此我們对这类材料使用特別慎重，尽可能不用它。对談同一事件或同类事件的材料，我們进行了仔細核对，如鄂东抗日統一战綫形成的時間問題，各县調查材料都說是1937年冬七里坪談判开始，但亲身参加談判的何耀榜同志在“大別山上紅旗飄”一書中說到，七里坪只是一次赴宴，統一战綫的形成是在“岳西談判”之时。經過研究核对，我們采取了后种材料。經過这番熟悉与辨别，我們从七百余万字的材料中抽出較精較真的約一百万字的材料，汇集成“原始資料汇編”。

“原始資料汇編”，还是感性的認識，是表面的、片断的历史現象的綜述，还不能說明鄂东历史的本質与內在联系，还有待于提高到理性上来加以認識。因此我們进一步地运用毛澤东思想对它所提供的基本材料进行了研究，然后編出一个有体系、有观点、有骨干材料的提綱。編提綱的主要目的是明确观点，也就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夫。我們認為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更具体学习和运用毛澤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来研究、分析鄂东的历史实际，从而形成符合毛澤东思想的具体观点的關键。这时候，我們特別強調运用边学习理論（主要是学习毛澤东著作）、边研究材料、边形成观点，达到观点与材料統一的“三边”原則，和發揮集体討論的作用。經過这一步，就把大量的感性知識提高到理性知識，对問題的認識又进一步的深化了。例如土地革命初期“黃麻秋收起义”的队伍向木兰山进军的問題，执笔的同志原先認為没有什么意义，經過一阶段的鑽研和充分的討論，才認識到这次进军的意义很大，是在实际斗争中摸索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开端。

編出提綱以后，我們不仅已掌握了材料，而且从这些材料出发形成了体系和观点，工作就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編写党在鄂东地区革命斗争史資料（初稿）。我們的解法是：以毛

澤东著作和上述的提綱为指导，又回过头来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分析“原始資料汇编”及其他有關的材料，再次的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尤其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的工夫，使材料和观点更进一步的統一起来。例如1932年五月，我紅四方面軍在苏家埠战役中，取得了空前未有的胜利，共計活捉了敵軍总指揮厉式鼎为首的旅团长十余名，消灭和击潰敌人約三万之众，俘敌一万八千余人，繳獲各种炮数十門，輕重机枪一百五十余挺，长短枪万余枝，粉碎了敌人对苏区的第三次圍剿。为什么在第三次“左”傾路綫統治下，会取得如此輝煌的胜利呢？执笔的同志开始認為是“左”傾路綫尚未貫徹到軍隊以前，在徐向前同志的具体指揮之下取得的。經過小組討論，才进一步認識到取得胜利的首要的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以徐向前同志为首的紅軍指战員坚持和貫徹了符合毛澤东軍事思想的正确軍事路綫，使第三次“左”傾的錯誤軍事路綫沒有很快得到貫徹，因此这不仅是正确指揮的胜利，而且是毛澤东的軍事路綫的胜利。这样，把問題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揭示了历史的本質。此外，执笔的同志还怀疑苏家埠战役圍城长达五十四天是否違背了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的毛澤东軍事思想；經過反复学习“中国革命的战略問題”一文，反复分析具体材料，終于認識到这次圍城的主要目的在于“打援”，在于“吸引援兵”，“釣大魚”，圍城虽然长达五十四天，但“打援”的每一次战斗却是速战速决，許多敵軍在来援的途中就被我們消灭和击潰。“打援”的結果不仅消灭了大量的敌人，而且使被圍困的敌人援絕粮断，不得不无条件投降，从而取得整个战役的偉大胜利。所以苏家埠战役不仅沒有違背毛澤东軍事思想的原则，而且是这一原则的具体灵活的应用。这样認識就达到了毛澤东思想与具体史实的有机結合。

在应用提綱来編写資料（初稿）的同时，又一次的檢驗和修改了提綱，最后通过按語的形式，把观点和材料融合为一个整体，至此，就完成了“党在鄂东地区革命斗争史資料”（初稿）的編写任务。

这样依次編写大事記、大綱和原始資料汇编、提綱，最后編写資料初稿，这一系列的做法是科学的做法。这是以毛主席教导的認識客观世界的規律为指导，对材料进行反复研究，从感性認識进入到理性認識的过程。随着研究工作不断的深入，随着認識过程的反复进行，我们对資料認識不断深化，終于达到比較合乎鄂东革命实际的科学認識，編写了基本符合要求的資料（初稿）。因此，这是符合毛主席在實踐論中闡明的馬克思主义認識論原理的。

为了进一步說明这一認識的提高过程，这里举出一个具体例子。

土地革命初期“黄麻秋收起义”的队伍向木兰山进军的問題，执笔的同志开始接触到有關的材料，編写大事記时，認為进军是“被迫逃跑”，队伍也只有七十二人、五十三枝枪，“没有什么意义”。这时期的認識尚处在感性的阶段，为表面的、片面的現象所迷惑。到編写大綱时，認識就前进了一步，觉得他們七十二人冲破敌人无数包圍的斗争是十分艰苦的，其英勇事迹是可歌可泣的。到編写原始資料汇编时，在进一步熟悉材料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材料，看到上木兰山的队伍已有些政权思想，如建立了地下陂安南县和梅广苏維埃等，因此認為向木兰山进军“有些意义”，并觉察到所謂“被迫逃跑”的看法是錯誤的。到編写提綱的初期，执笔的同志讀了“井崗山的斗争”等文章以后，得到了启发，認為木兰山进军的意義很大，可是又生搬硬套毛主席的結論，認為向木兰山进军和向井崗山进军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小組討論时，对具体的材料进行分析，認識到向井崗山进军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进行科

学分析后确定的战略方針所指导的,是自觉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的結果,是全党的方向,而向木兰山进军是从革命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从而糾正了把它与井崗山进军等同起来的錯誤看法,得出了比較符合实际的結論。最后在編資料初稿的时候,对这个問題的認識又进一步提高了,認識到向木兰山进军在客观上是符合毛澤东思想的,是退却与进攻的正确結合,是走向“工农武装割据”的开端。它虽只有七十二人和五十三枝枪,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后发展为鄂豫皖苏区,并建立了紅四方面軍,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因此在資料初稿中,对木南山进军問題作出了“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的評价。

四、爲了貫徹毛澤东思想,在地方革命史(資料)編写工作中應該注意的几个問題。

關於編写地方革命史(資料)的原則,各地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有許多体会和創造,这里就我們体会較深的三条談談我們的看法。

1. 必須以全国形势为背景写地方革命斗争;从全国形势出发写地方特点。

任何地方革命斗争都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部分,都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統一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的发展規律的基本点是与全国一致的,也是在这个基本点一致的前提下,才能談到它的特点。因此地方革命史是通过地方革命的特点,具体地反映全国革命发展的共同規律,而它的特点又正是在与全国革命斗争相联系、相比較中显示出来的。写地方革命史(資料)既要与全国形势相联系,又要写出其地方的特点。例如,我們在前举出的抗日战争时期敌我頑三方軍事斗争的关系問題,就只有紧紧地把握住全国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这个总的形势,才能处理好。又如前面所举大革命历史分期的例子,就必须联系全国形势的前提下,写出地方特点——以“馬日事变”为失败的起点,而不以“四一二事变”为起点,才能反映历史实际。再如“黄麻暴动”的意义問題,必須与“八七會議”、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及南昌起义、湖南、广东农民起义等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分析,才能看出它是在“八七會議”号召下举行的,因此使土地革命的意識深入广大农民之中,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开始。它所建立的为时20余天的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緒,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鄂东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2. 主要写革命胜利成功的方面,写革命的暂时失败与挫折时,一方面要揭露敌人的反革命兇恶面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写党和羣众的英勇斗争,并从中預示出革命必胜的前途。

写革命史的目的就是要以革命必胜的信心和革命者的英勇斗争精神教育人民和后代,因此,着重写革命的胜利成功与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方面,是革命史思想性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个要求是比較容易明确的,問題在于如何写革命的失败;不写是不对的,因为那会向人民散播一种革命輕而易举的錯誤觀念,而且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如何写法呢?毛主席指示得十分明白,他說历史上一切反动势力的发展邏輯永远是“搗乱,失败,再搗乱,再失败,直到灭亡”,而人民力量的发展邏輯永远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我們必須以毛主席这个观点来把握革命史上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发展邏輯,以新生事物必然胜利的信心和新生事物的成长必然要经历艰苦斗争的观点看待革命力量的发展,看到和写出革

● 毛澤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11頁。

命的暂时失败中包含着胜利，敌人的暂时胜利中包含着失败，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待革命的失败与挫折，反对失败主义情绪。具体地说，写失败时，既要揭露敌人，更要歌颂人民的英勇斗争，不应当为写失败而写失败。我们有同志曾认为既然是革命的失败，“敌人的反革命暴行写得越多、越典型就越好”，“白色恐怖的气氛造得越足越好”，并把革命者英勇斗争以反抗敌人暴行的具体材料删去，结果使人感到反革命力量把革命力量完全压倒了，效果很坏。又如有的同志曾照搬原始材料，使用“豺狼万状”，“走向崩溃的前途”等词形容红25军秋收斗争的失败，这种歪曲历史的编写，读了使人感到十分沮丧，看不到革命胜利发展的前途。这些都是违反毛主席所指示的革命力量的发展逻辑的，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反映，既违反了党性原则，又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全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人民与反动派两种力量斗争的历史，是人民斗争和胜利的历史，反动派捣乱和灭亡的历史，每个写历史的人都应当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这两种力量不同的发展逻辑的指示，以此把握住全部历史的本质。

3. 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写正确路线的发展与胜利，因此，应当以正确路线为主体、为红线，而不应当以错误路线为主体。在错误路线暂时地占着统治地位时，也应该着重写正确路线对它的斗争，显示正确路线必胜的前途。批判错误路线，应以从反面证明正确路线是唯一符合革命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路线为目的，并显示出正确路线对革命胜利的决定性作用。在写法上，应针对错误路线的政策进行批判，不必列举许多错误事实。

我们所迁到的是鄂豫皖苏区在第二、三两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路线斗争问题，这两次“左”倾路线都曾在鄂豫皖苏区占统治地位，特别是作为第三次“左”倾路线具体代表的张国焘路线，统治时期较长，而且造成了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和苏区的大部丧失。从原始材料看，揭露错误路线的材料多，反映正确路线的材料少，而且前者具体生动，后者比较抽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开始时缺乏明确而牢固的关于在整个革命史的长河中，正确路线是主流，任何错误路线，即使它曾经在短时期占了统治地位，都只是一股小小的逆流观点，很容易就被材料反映的现象所迷惑了，以致没抓住历史的主流和方向，把错误路线的发展当成了鄂豫皖苏区1930年至1934年历史发展的主流。例如我们把1930—1932年初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一段，划分为二次“左”倾路线的统治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两节，其中包括“左”倾思想与“左”倾政策的发展、“左”倾路线对军事、经济等等的的影响、“左倾克服的不彻底”等一系列的小标题。这个错误体系后来作了多次结构上的修改和主导思想的修改，而关于应以正确路线为发展线索的问题直到最后才彻底明确起来。主流抓错的结果，根本模糊了写路线斗争的目的，看不到正确路线在实际斗争中必然产生和确实存在，而把“左”倾路线看成是统治了一切，故而对“左”倾路线统治时期苏区斗争所获得的光辉成就没有提到路线的高度来加以肯定，只说是苏区军民的英勇斗争和指挥正确获得了成绩，如象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那样伟大的胜利只作了“指挥正确”的结论。在批判“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如反富农政策中的募款，把如何募法，数目款项（如赤卫军的武器费，童子团的木棒费）等都写上去。有时还有抹煞一切的倾向，如征收统一累进税的问题，只写它的限制小私有制发展的错误目的，不写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对贫雇农免税的于人民有利的一面，甚至还因为强调“左”倾路线指导的失败而抹煞了党和群众的英勇斗争。如红25军围攻七里坪四十二天的一役，因为是错误的、失败的攻坚战，就只用

以証明“左”傾路綫战略的錯誤，說它“根本就不應該打”，在这个前提下，紅25軍苦战四十二天，打得敌人不敢离城寸步，苏区人民自己吃草，把南瓜等食物送給部队吃，这种种光荣而英勇的業績，就都退居到不足道的地位去了。总之，苏区被写成了一片灰色，違反了党性原則，歪曲了历史的真实。

总的來說，我們虽然力求更高地举起毛澤东思想的紅旗，更好地完成这次資料編写任务，但由于水平的限制，在学习和运用毛澤东思想方面都还是做得很不够的，而且如前所述，也走了某些弯路，因而編写的資料还没有能够完全正确地反映鄂东地区革命斗争史的发展規律。总结这次工作的一些体会，是为了今后在学习和运用毛澤东思想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故希望讀者多給我們指正。